

代慈善思想的起源 诸子百家与我国古

□ 运城学院思政部

谢忠强 李云



孟子像

随着近年来自然灾害的频发、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凸显以及我国

社会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慈善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热点。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就诸子百家与我国古代慈善思想的起源的联系进行初步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慈善思想

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其影响中国社会之深远,堪称诸子百家之首。其思想虽“以维护礼制为出发点”^[1],但也蕴含着大量的慈善思想。

“仁”是孔孟儒家的核心。“仁者爱人”,作为儒家鼻祖的孔子不但将“仁”作为统治者

为政的要求,更揭示出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相互关爱的普世性意义。在此基础上,孔子还将“尚仁爱”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最终“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继孔子之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仁”的学说,并进一步把“仁政”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孟子虽然因孔论仁,但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透过“仁政”的政治学层面,将其“广而化之”,重新做了民生主义的诠释,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中的慈善成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孟子看来所有仁爱之行、慈善之举都是人的本能。缘于此,人们恻隐之心的内心情感也就被孟子直接升华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并逐渐地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情感奠定了儒家慈善思想的基调。

以“仁”的思想兼顾统治者的为政之道

与民间社会的互助伦理相比,孔孟儒家的“重民思想”则更加凸显政治角度的慈善需求。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到春秋时期,敬畏民心、注重民事的思想在相关典籍中屡见不鲜^[3]。孔子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更是从“得天下”的政治高度劝诫“为政者”接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认为采取“与之聚之”的惠民举措,予民众以福利,使“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才能赢得天下。孔孟都着力提倡“民为邦本”思想,在实践上主张“惠民”,而这也应当被看做儒家慈善观的又一重要内容。

除了“仁”的思想和劝诫为政者“重民”之外,孔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及其“义利观”也是儒家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在安定和谐的社会里,人们无贫富差别则“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此基础上,他以大同思想号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则主张社会个体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与孔子的“大同”之说前后呼应,共同构成了儒家大同思想的精华。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后世举办慈善事业影响深远,许多乐善好施者即多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扶危济困。在社会理想中以“大同”为期许的孔孟儒家,在义与利的选择上,也必然会取义而舍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孟子对于义的重视程度比孔子更甚:“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受孔孟义利观的影响,古代众多儒者大都重义轻利,不慕虚名,孜孜以求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

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慈善思想

除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儒家的入世精神有所区别的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更加追求万事万物“自然”的存在状态^[4]。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善恶为评判标准的价值体系,无疑也为“以善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慈善思想^[5]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源泉。

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理解。“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之源,虽不可名

状,却可赏罚应时。由此,他提出世间万物均须遵循于“道”^[6]。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的这种全社会共同向善的观点经过后世的进一步升华便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劝善去恶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源泉。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老子思想中的一系列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庄子认为,“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即世俗社会中的人们可以通过修行得“道”升天,得“道”之人就是“真人”。而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庄子认为做善事顺应自然,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显而易见,作为道家思想的两代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在善、恶因果方面的认识是有着共通之处的。而在封建社会中,唯心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自然而然地具有劝人从善的教化功能。

在道家的经典教义《老子》、《庄子》中,善恶报应是其反复强调的社会伦理,甚至以“积功累仁,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等道德信念当做其心目中理想社会的道德支柱^[7]。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无为而治”、“民风淳朴”的乐土。他对严苛的政治统治深恶痛绝,他认为正是由于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才造成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他提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

与老子略有区别的是,庄子长期过着隐居生活,追求“与天地万物游”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状态,故其关于社会民生的论述更具纯真、自然的色彩,其关于道的理解与阐释更大程度上是以“人的主体精神”为立论基础的^[8]。庄子在社会经济领域主张“富而使人分之”^[9],这一提法虽有“平均主义”的空想倾向,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对于救济灾荒,亦多有借鉴。在社会思想中,庄子认为当政者不仅要“爱人利物”,更应效法“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综观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教义,“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是其思想体系核心理念,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继承了殷商时期就广为流传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道德教化,并对其按照道家思想做了世俗化的重新演绎,最终形成了道家所特有的影响传统社

一、雅乐之名

雅乐之名,当源于歌辞“典雅纯正”之意。在《毛诗序》中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毛诗说》云:“雅者,正也。雅本鸟名。雅之飞也,必满张斜亚,其翼之大翎,如牙之列而使其身使正。犹歌诗者必咏言摇曳其音使之合律,而后其声始正也。风由乎俗,雅关乎于政,此风雅之别也。雅有小大也,政亦非有小大,以其主乎国中则谓之小雅,对乎天下则谓之大也。”一方面是纯正的合乎规范的意思,故儒家推雅乐为正声。《尔雅》疏说“雅,正也。”《白虎通·礼乐篇》云:“乐尚雅,雅者,古正也。”另一方面“正”通“政”,“政”与朝政之事相关联。政绩的显著与衰退,不同的政治场合,等级制度的殊异,都以“雅”加以不同程度区别。历代政权,制乐作礼以歌颂本朝的文治武功,才有雅乐。宋代朱熹云:“《诗》古之乐也。亦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若大雅小雅则亦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作大雅,按小雅体作小雅”。“小雅燕享之乐,大雅朝



古代雅乐考略

□ 信阳师范学院 员苗苗

会之乐”。小雅是典雅、庄重、雍容、平和的音乐的形式美。大雅是宽广、正统、庄严、盛大的形式美。大、小雅代表古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最高艺术水平。人们在雅乐声中祈求天神降福、聆听先祖的遗训。各种不同类型的乐舞、乐曲在金石乐器的伴奏下广泛运用于各种繁缛复杂的仪式典礼,雅乐成为周代典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周代政治、伦理实践的独特方式^[1]。西周

时,雅乐已走向成熟,出现了“六代乐舞”、宗教性乐舞、小舞等。六代乐舞中,有黄帝时崇拜天神的《云门》、尧时崇拜西方日落之处的《咸池》以及为王者所歌功颂德的音乐如《大夏》、《大武》等。这些代代相传而被各代帝王用作国家典礼及宗庙祭祀音乐的乐曲。既能够表现人的情感,又能陶冶人的情操,既能够感化人心,促人向善,又关系国家兴衰的高雅音乐。

二、雅乐类型

1. 祭祀之乐。祭祀之礼是指用以沟通人与神、人与天之间的关系,是古人认识世界,把握自然与社会唯一有效的方式^[2]。五礼之中,由于祭祀之礼事神致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受到格外重视。至殷、周之世,祭祀更被当做国家无与伦比的头等大事,国运之兴衰与祭祀直接发生联系。《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代以前一直上溯到远古图腾时代,原始先民就是在乐声中翩翩起舞感受着神灵的召唤,表达着他们无限的虔诚。《易传·豫卦》云:“先王

会中下层民众慈善行为的伦理体系。

三、其他流派的慈善思想

在诸子百家当中,除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外,管子的思想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思想中也蕴含着重要的慈善内涵。

管子的慈善思想非常广博,“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是其最集中的体现。“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遣之以利”及“宽其政”。其中“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窶,振罢露,资乏绝”等内容。所谓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其内容广泛涵盖了对老人、儿童、穷人、病者等弱势群体的救济。更为重要的是,管子还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他主张,对于年长者,国、都均由专门人员执掌,月赐酒肉,死予棺槨,并“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慈幼之政亦在国、都设职掌管,适当免征“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的赋役和兵役。除了对于弱势群体提出相应的救助政策外,管子还非常重视社会对于贫困人群的救济。他提出,要敦促乡党参与本地的贫困

救助,弄清贫困户的基本情况,上报官府,以便于“散仓粟以食之”。

与管子的慈善思想更多的是为当政者提供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不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慈善思想更多的是从下层社会所向往的“兼爱、非攻”的社会理想而展开的。墨子本人和他的门徒大多是来自于社会的下层,因此,“他们对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和苦难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10][180]},对社会救助工作尤为重视。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也是墨家慈善思想的集中体现。墨子希望“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并号召世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把“爱”和“利”相统一,认为“兼而爱之”就是“从而利之”,“兼相爱”等同于“交相利”。墨家主张,社会上每个人都应竭尽其能,从体力、财力、智力各方面帮助别人,去实践“兼爱”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慈善理想。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爱”思想由此具有了平等性,墨子认为兼爱应该“远施周遍”。基于“兼爱”墨子还提倡“非攻”,主张

“勿杀无辜,矜恤弱寡”。

除了强调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平等之爱的个体情感外,墨子还从防灾、备荒高度,为统治者的“荒政”建设提供政策指导,并对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救灾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墨子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备也,地不可不用也,用不可不节也”。即粮食安全是防范饥荒的必备条件,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而言,都不能不广泛储备,并在日常用度方面厉行节约,只有充分重视粮食储备,才能确保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2]周秋光.中华慈善思想渊源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
 - [3]葛慧焯.儒、佛、道思想与中国传统慈善事业[J].文化学刊,2007(5).
 -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1966.
 - [5]谢忠强.民众、社团与国家:关系语境下慈善组织的社会定位[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2).
 - [6]周秋光.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J].道德与文明,2006(2).
 - [7]余日昌.慈善[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8]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1973.
 - [9]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54.
 - [10]甄尽忠.先秦社会救助思想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本文系山西省高校人文重点基地河东文化项目(HY-2009005)和2009年度山西省高校哲社课题(200922035)的阶段性成果。